

券商承销收入翻倍 40家公司仍未开张

今年以来,受益于新股发行常态化以及科创板业务贡献,券商IPO承销业务收获亮眼成绩单。8月5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前7月券商IPO承销合计收入114.17亿元,同比增幅翻倍,但与此同时,行业业绩分化明显,有40家券商今年该业务颗粒无收。伴随着注册制的实施,中介机构责任加大,对其风险质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券商也将目光投向内部组织架构改革,以更好应对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

2020年1-7月券商IPO承销情况

IPO承销规模2396.35亿元

IPO承销收入114.17亿元

2019年1-7月券商IPO承销情况

IPO承销规模1050.14亿元

IPO承销收入56.97亿元

2020年1-7月新股发行情况

全部上市上市数量201家

科创板上市数量73家

2019年1-7月券商IPO承销情况

全部上市上市数量103家

科创板上市数量25家



数据来源:Wind

科创板贡献主要增量

今年以来,券商投行业务斩获颇丰,其中IPO承销业务表现尤为抢眼。8月5日,北京商报记者据Wind数据统计,2020年1-7月IPO承销共计为53家券商贡献收入114.17亿元,这一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00.4%。

从募集资金情况来看,今年前7月券商IPO承销募集金额高达2396.3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1050.14亿元,同比增长128.19%。

“承销收入上涨主要原因是承销金额上涨,而承销金额上涨与企业发行家数较去年同期增长有关。”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2020年以来,新股

保持常态化发行,且监管审核节奏有所加快。数据显示,前7月证监会发审委共审核IPO项目270家次,过会率为94.44%,对比去年同期情况,发审委审核首发项目仅115家次,通过率为85.22%。更多的过会企业,意味着会给券商带来更多的承销保荐收入。

梳理今年上市项目情况可以发现,今年前7月,共有201家企业成功上市,对比来看,去年同期有103家企业上市,这其中增量主要来自于科创板项目持续扩容的贡献,今年前7月有73个科创板项目成功上市。

“受益于科创板注册制的稳步推进,券商IPO承销收入较去年同期显著增加。去年上半年科创板尚未推出,而至今科创板已运行一年有余,是券商承销业务收入在今年实现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

究员何南野如是说。

40家承销收入“挂零”

在券商IPO承销业务大幅增长的同时,分化趋势也越发明显。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93家拥有承销保荐资格的券商中,有40家券商IPO承销收入“挂零”,包括红塔证券、首创证券、英大证券等至今“未开张”。

而头部券商在IPO承揽与发行方面,正不断体现出整体服务优势。从赚钱能力来看,“三中一华”地位不可撼动,年内收获盆满钵满。中信建投、中金公司今年前7月IPO承销收入均超10亿元,分别收入14.34亿元、10.54亿元。中信证券紧随其后,以8.37亿元的IPO承销收入排名第三,华泰联合证券以7

亿元收入列于第四位。“三中一华”分食了32.25%的市场份额,此外,排名前十的券商IPO承销收入合计占券商该项业务整体收入超过六成。

在科创板业务方面,项目向大券商集中趋势也愈发明显。Wind数据显示,目前有7家券商服务科创板项目在20个以上,中信证券服务家数最多,为55家,中金公司服务37家,中信建投、华泰联合、国泰君安服务家数分别为34家、32家、31家。

对此,王骥跃表示,排名前十的券商已经占据半数以上市场份额,而排名靠后的券商,市场知名度较低,难以获得业务机会。从机制、人才、市场方面而言,中小券商相对落后,综合竞争力较头部券商而言也不足,在市场竞争中陷入劣势。

“大投行”时代竞速

“大投行”时代各券商竞速,也对其合规风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就在券商总体承销收入大幅上涨的同时,部分保荐机构的问题也暴露出来。

7月3日,证监会官网集中公示了14张投行罚单,科创板业务成为违规“重灾区”,监管点名的券商投行包括海通证券、德邦证券、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招商证券、光大证券等。此外,受累康美药业300亿元财务造假案,广东证监局7月22日公示了对于作为“看门人”的广发证券开出的15张罚单,该公司保荐机构资格被暂停半年。广发证券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将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并按照内部问责制度对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

伴随着注册制的实施,中介机构的责任加大,部分券商也将目光投向内部组织架构改革,以更好应对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例如,近日,华安证券投行部进行了包括将投行综合管理(质控)部更名为质量控制部,专职于投行业务质量控制工作”等三项组织架构调整。此前,今年4月国泰君安也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其中包括设立投行事业部,下设投资银行部、债务融资部、资本市场部、投行质控部4个部门。原质量控制组更名为投行质控部,调整为一级部门。

对此,何南野指出,投行的质控部,主要在投行内部把控好项目的风险,属于第一道防线,也是较为重要的防线。在当前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项目风险也在不断放大,这使得项目团队与投行质控部、公司风险管理部需配合更加紧密,合作信息充分分享,利益更加一致,共同把控好项目风险。整体来看,投行业务架构的调整,核心是服务于业务发展,目的是为了理顺权责利之间的关系,改革之后的投行架构,灵活性更强,更有利于当前注册制改革发展的需要。”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马楠 实习记者 李海媛

农商行“抱团”求解资产质量难题

如何实现“1+1>2”

分析人士指出,农商行通过合并或入股可以提升自身能力,增强竞争优势,同时也为经营良好的农商行打开异地扩张空间,预计未来农商行间的合并重组趋势将更加明显。不过,这并非简单的“1+1”计算题,如何实现“1+1>2”才是参股、重组的意义所在。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中小银行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有助于理顺股权结构混乱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有效化解金融风险,扩大银行资产规模。由于地方法人银行在区域经营、风险识别等方面具有优势,部分实力、经营能力相对较强的农商行通过跨区域入股,有助于拓展异地业务空间、产生一定协同效应。

在徐继峰看来,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曾表示,今年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力度会比较大,预计农商行间相互入股、合并的情况还会发生,特别是一些经营不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风险抵御能力弱的中小银行,都会存在合并重组的可能性。

虽然农商行之间入股是双赢的选择,但是互相入股合作后,能否真正做到“1+1>2”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徐继峰认为,中小银行间的合并重组要注意融合,不仅仅是规模上变大了,要从注重发展质量入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以更加稳健的理念进行经营。同时合并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不是利用行政手段强行合并。

同时,农商行间的互相投资行为可能也面临着监管的挑战。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此前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足够财力的情况下,为了处置风险,简单化地“大堆”、“搞拉郎配”,试图借助好的农信社来解决差的农信社的风险。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破坏金融机构体系的完整性,立足本土、小而精的农信社受到打击,出现越来越多大型农村金融机构,转而追求大项目、大客户和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农信社下沉重心进行更好的“三农”和小微金融服务。”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吴限

农商行被同业投资入股日渐频繁。8月5日,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已有十余家农商行间合并或入股参股交易获得监管批准,还有多家农商行处于筹备阶段。分析人士指出,通过引入经营良好的农商行有助于解决小型农商行的风险问题,也有助于经营良好的农商行实现跨地域发展。不过,合并重组并非简单的“1+1”,能否真正发挥作用面临着挑战。

11家农商行入股获批

增强抗风险能力

农商行之间股权投资再添新案例。福建银保监局8月3日发布批复称,同意筹建福建部武农商行及其筹建工作方案。同时,同意福清汇通农商行、平潭农商行分别参股福建部武农商行2000万股,占福建部武农商行股本总额比例均为6.73%。

资料显示,福清汇通农商行成立于2011年12月,前身为福清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7年11月登陆新三板市场,目前注册资本为15.63亿元。平潭农商行成立于2012年9月,注册资本为5.09亿元。

无独有偶,最近两周内,还有多家农商行被同业合并或参股。7月28日,江苏银保监局正式批复徐州农商行筹建,该行由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和徐州彭城农商行新设合并而成。其中,无锡农商行和江阴农商行两家上市农商行也是发起人之一,预计分别持有徐州农商行总股本的10.95%、4.73%。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商行之间的投资情况也愈演愈烈。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初至8月5日,已有至少11起农商行合并重组或参股入股事件获得监管批准,此外,还有多起农商行合并投资事宜在筹划中,比如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市政府5月15日发布文件称,合并三门峡湖滨农商行、三门峡陕州农商行,组建市级农商行。

对于出资筹办徐州农商行,江阴农商行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参股是为落实普惠金融战略,更好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强化区域协同效应,提升社会影响力。同时,北京商报记者也尝试联系其他多家银行,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在分析人士看来,农商行之间合并或入股来源于增强抗风险能力的诉求。众所周知,农商行脱胎于农信社,普遍存在着先天素质不高、抵御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在经济下行压力叠加疫情冲击下,部分农商行受到冲击,资产质量承受着压力。

银保监会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4.09%,远高于银行业平均1.91%的不良率水平。并且,由于疫情对不良资产的反映有一定时滞,业内普遍预计今后一段时期不良贷款会陆续呈现和上升。

而银行间的合并重组是有效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种手段。民银智库民营企业研究团队负责人徐继峰认为,近年来,中小银行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小银行存在的运营不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潜在风险等问题逐渐暴露,对金融业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等。通过对中小银行进行合并重组,可以增强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有效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合并重组的背后也有监管政策的鼓励支持。今年4月,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当前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有一些中小银行历史上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比如内控不完善、公司治理不到位,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对于这样少量的机构,我们还会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一行一策,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比如直接投资重组、同业收购合并、设立过桥银行、引进新的战投等,加快改革重组。”

幸福人寿临时班子搭建 多关键部门负责人离场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陈婷婷 刘宇阳)

随着7月底党组织划转和股权交接仪式的落地,近日,幸福人寿临时班子正式搭建完成。8月5日,北京商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幸福人寿已完成了党委和临时经营班子的分工,多位人保系前高管“入场”。与此同时,多个关键部门负责人“离场”,共涉及27人的职位变更。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人员的变更,或代表着幸福人寿的各项调整已然开始,未来在各险种布局和业务方面有望出现进一步的变化。

据悉,幸福人寿已于近日完成临时经营班子的搭建和分工,任命8人临时负责对应部门及相关业务。具体来看,此次任免既再度提及了王慧轩作为党委书记和临时负责人的任职安排,也明确了此前党组织划转上任任命为公司党委副书记的廖定进的工作内容。

据知情人士透露,廖定进任销售创新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临时协助负责个险营销部、团体/中介部、健康险事业部、银行保险部、业务运营中心等多个部门的工作,还分管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从此次廖定进分管的工作来看,若未来任职获监管核准,其或有望成为幸福人寿的下一任总裁。

同样在幸福人寿临时党委委员会名单中的郭俊和王家春也有了各自分工。其中,郭俊拟任临时审计责任人、临时董事会秘书,分管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审计部、纪检监察部等;王家春则拟任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临时协助负责投资管理中心、资金运用业务审核办公室工作。需要注意的是,上述4位都曾就职于中国人保集团旗下子公司,此次则齐聚幸福人寿。

另外,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临时经营班子的名单中也出现了一位幸福人寿的元老级人物——詹肇岚。公开信息显示,詹肇岚曾任中国人寿

务管理部处长、东方人寿精算师,以及嘉禾人寿总精算师,在幸福人寿于2007年11月成立后不久,次年6月起担任副总裁和总精算师。就最新分工来看,詹肇岚的职位不变,分管精算部和市场部。

而在临时经营班子明确分工的同时,北京商报记者也了解到,幸福人寿包括法律责任人、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向俊,纪检监察部、投资管理中心、资金运用业务审核办公室等多个部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以及处长人选被免去,累计达19人。

对于上述变更是否属实,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幸福人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相关回复。在业内人士看来,党组织划转及股权交接完成后,幸福人寿的各项调整已然开始,未来在各险种布局和业务方面或有进一步的变化。

幸福人寿是中国信达于2007年发起设立的一家寿险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情况并不稳定,2018年,由于权益投资出现较大损失,幸福人寿全年净利润巨亏68亿元,成为当年亏损最大的寿险公司。最终,中国信达在“突出主业”的战略考虑下,决定出售所持有的幸福人寿的全部股权。今年7月17日,中国信达一则关于股权变更的核准批复,宣告该险企入主幸福人寿“靴子落地”。

就人员“大换血”给保险公司带来的影响而言,北京一位保险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主要取决于公司的当前状况。如果公司处于较明显的绩效下滑或业务停滞状态,那么大面积更换管理层大概率是好消息,反映出公司在破旧立新;反之,业务平稳较快发展的公司通常不应主动大面积调整管理层。业务方面,则可能会收缩长期不盈利的险种或项目,而发展与新股东有资源关联或新任高管擅长的领域。